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五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二七期 ——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1c）

【诚心忏悔】	两份道歉辞	刘 进 · 宋彬彬
【见证历史】	我曾目睹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被打死那一幕	宋正容
【拒绝遗忘】	澄清真相 分清主次	丁 东
【追究真相】	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的历史迷障	刘 长
【直面良心】	宋彬彬的“错”和“罪”	徐 贲
【往事非烟】	雁落塞北	张曼平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九）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诚心忏悔】

两份道歉辞

〔编者按：刘进和宋彬彬，是原北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班的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分别任学生会主席和副主席。这是她们向当年北师大女附中的老师、学生以及部分老师的后人致歉的讲话。时间：2014年1月12日，地点：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东一楼会议室。〕

我的道歉

• 刘 进 •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老三届的校友们：

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冒着严寒来到学校，参加这个聚会。感谢母校老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谢现任领导为我们提供场地和方便，让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师生

见面。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长塑像的会议室里，回顾48年前发生的那场劫难，校园秩序大乱，师长被批斗，学生斗学生，黑白颠倒的行为却被奉为革命，直至发生了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残酷事实！我的内心充满懊悔和痛苦。是卞校长的死，让我猛然惊醒，我多次问自己，这就是革命吗？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对不起胡校长、刘校长、梅主任、汪主任，对不起受到伤害的老师、同学们。这种负疚感，让我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上面，归结到运动中的身不由己，或者归结到教育路线，我应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为，是我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是我，作为工作组期间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在工作组撤走以后，没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发起游斗校领导过程中学生发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

我要借此机会，向老师们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道歉，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我也要向校友们表示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你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而道歉。最后，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你们打破禁忌、提供了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实情况，是你们刻骨铭心的自身经历，帮助我在调查和厘清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中，接近和寻找到真相。我感谢许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你们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你们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对阶级斗争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帮助我打开视野、换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观照自己时，有了更大的勇气和持久的动力。

在对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1、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

4、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国家才有安定。

我认识到，直面历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尊重、宽容、互助和大爱，才能使侵犯人

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后我想说，我爱我的母校，爱我的老师，我爱我的同窗校友，感谢你们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

谢谢大家！

刘进

2014年1月12日

* * * * *

我的道歉和感谢

• 宋彬彬 •

今天我特别激动，很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见面会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还不到70岁，在座的老师都比我年长，许多老师年高体弱，如朱学西老师都近90高龄了，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会议，我非常感动。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能听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二是 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力，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

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维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悲剧，忘记了过去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

□ 原载：共识网

~~~~~

【见证历史】

我曾目睹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被打死那一幕

• 宋正容 •

北京女三中坐落在西城区白塔寺附近，现在叫159中学，是一座不起眼的学校，而在上

个世纪，它却赫赫有名，聚集着一代女子年轻蓬勃的生命、智慧与才气。我的中学母校离这里不远，也是一所不错的女校，与女三中不同的是，我的母校女六中解放初期叫辅仁女中，是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具有肃穆的教会色彩。我之所以对女三中不能释怀，不仅是因为它离我的母校近，离我的家近，而是因为亲历的、发生在60年代的一幕惨剧……

沙坪是当时女三中的校长，一位非常干练的从延安时代走过来的老革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沙坪都是一个不应该也没有可能死于非命的老革命。然而，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在那个风雨如磐、颠倒黑白的日子。

那时候，北京街头的高音喇叭播送毛主席语录和高亢的革命歌曲，街头涌动的是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红旗与忠字齐飞，狂热共肃杀并存。学校已经不再是学习知识的场所而成为展示革命风采、批斗走资派的战场，如果谁在这时拿着书本求知，那一定是得了神经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厄运随时可以降临在每一个善良的人头上。沙坪就这样无辜的成了走资派。我不曾记得她是否象我们女六中的女校长冉亚那样：每日上班的皮包里装的是一块写有黑帮分子的牌子，就像现在的身份证一样装在身边，随时准备出示，所不同的是：这块写有黑帮分子的牌子随时准备挂在脖子上，迎接一场场带有人格污辱的批斗？批斗会结束，在所谓的革命歌曲和革命口号声中，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就真的像是牛鬼蛇神了，如果她们不像牛鬼蛇神，那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又像什么呢？所以必须把他们真正搞成牛鬼蛇神，无论从形象上还是舆论上……舆论杀人真的是很厉害啊！

其实并没有什么原因，只不过沙坪是女三中的校长，一个当时名为走资派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的每个人都要在炼狱中走一遭，幸运者得以涅槃，不幸者在当时即以黑帮分子的身份真正下了地狱，死于非命。沙坪没有幸免于难……

已经记不清当时经过了多少次批斗会，也不能清楚知道沙坪的内心世界和苦苦挣扎，甚至连她究竟经过多少批斗会也早已经不能确定了。至今难忘的怵目惊心场景是：原来本是历代帝王庙的女三中校园，一进门有一座大影壁，紧靠着影壁处有一个旗杆的围栏。时值酷夏八月，骄阳当头，政治运动的燥热更是甚嚣尘上。沙坪在批斗会台上受尽人格的凌辱之后被圈在这个栏杆里，精疲力竭的蜷缩在那里，彻底被摧毁了信念和生命的尊严……写到这里，我想哭！皮肉之苦又算得了什么？人作为人的尊严被无辜剥夺之后的惶惑与无奈将是心灵的一场大劫难，人会失去定力，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而成为所谓的“牛鬼蛇神”。灾难和摧残并没有止于此，接下来的是更加残忍的折磨！革命热情没有释放完的革命小将，或者是在这场运动中分外惶恐、分外迷茫、分外不知所云、分外狂热的人群开始向校外流去，他们必经过那个作为历代帝王庙时的旗杆，他们必经过那个作为圈禁革命猎物的围栏。于是沙坪就像是被展览的困兽一样，裸露在人性抑或是兽性的海洋中……不知谁是第一人，反正她或他向沙坪投向了第一块石头，接着，也不知谁是第二个人，向沙坪啐了第一口吐沫，也不知谁是第三人，手拿着一根也许并不算什么的木棍向沙坪捅出了第一下。当然，人群的反应没有那么慢，在那个政治狂热的时代，人们的政治反应、政治敏感都处在一个非常时期，紧接着，人们都纷纷仿效，有的扔石子，有的吐吐沫，有的捅棍子，起初是团团围住，热浪喧嚣，慢慢的围斗的人群也累了、也散了……接着就是零零落落的人群走过，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坚定，表示自己在这场政治运动中的态度，他们都毫不怠慢的向沙坪扔出了那并不重要的一块石头，捅出了那并不重要的一棍，吐出了那并不重要的一口吐沫。是夜，那个本应是萌动着人生的多少乐趣与希望的夏夜，沙坪死了，就死在那个围栏里。没有凶手，没有组织者，其时，女三中的校园中已经没有了温文尔雅的女子。其实，女三中的校园中根本不会有什么大石头，也不会有太粗的木棒，但那是一个狂热淹没人性的时代，而沙坪就淹死在这人性扭曲的环境中。

我不知道沙坪生命结束时的内心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她能够恬静、平和的离开这个她热爱的世界吗？抑或是怨恨？她有子女，她的子女是否也憎恶她的。丑恶黑帮面目。而远离她？

现在，距离那个丑恶的时代已经过去四十年了。这四十年，世事沧桑恍如隔世，黄泉路上无老少，当年的许多革命小将可能已经也不在人世了，不知他们在弥留之际是否忏悔，是否为自己伤害了别人而忏悔。我知道有一个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小将得了癌症，在临离开这个世界时，她唯一感到不安、所需要完成的生命忏悔是她曾经批斗过的一位老师。这是真正的良心觉醒罢。

亲身经历那个时代的一代人大都到了知天命之年，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现在也走到了领导岗位上，也是当年那个“走资派”的位置。不知他们对当年、对当今做何感受？而大多数的那代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下岗，有些人因为不能苟同于现实而走到了边缘。这代人因为经历了那个非常时代而变得不同寻常，他们有的是天使，有的是魔鬼。但是无论是天使还是魔鬼，他们都不能不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他们或者因为经历了那个残忍的时代而非常残忍（红小兵时代就播下了利用权力整人的本能，播下了一贯正确的种子，播下了飞扬跋扈、叱咤风云的种子），或者因为经历了那个残忍的时代而变得更加温文善良，尽管善良在这个过度功利的过渡时期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但人性善恶的基因就是这样顽强的同步复制着。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也许不想知道、也根本不知道那个被称为“文化革命”时代的荒诞，他们完全不清楚中国历史上曾经翻过的这一页。他们不知道那个时代对于人性和短暂人生的惨痛摧残，他们没有伤痕也没有包袱，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全部，他们中的有些人可以肆无忌惮的张扬自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不惜歪曲事实，污蔑丑化他人，只要自己生活在阳光中而不管别人是否生活在地狱中，还美其名曰：“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历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一次次的重现、放大着人性，尽管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了，人间这幕精彩的人性悲喜剧却在以各种形式一次次的重演。历史重演一次是悲剧，再演一次是喜剧，人间喜剧正在一遍遍的上演。人性的进化就是如此缓慢。

确实，人性的进化是缓慢的，人类的知耻感在这样一个过度功利的过渡时代真的有所下降。如果我们不重温历史，那么我们无异于仍然生活在过去日子里。很幸运的是：我没有在那个被称为文化革命的年代做下伤害别人的举动。但我还是不得不常常在自省、在思考：我们对不了解的事能够断下结论、随便参与吗？我们对不了解的人能够随意参与伤害吗？我们真的不明白真相吗？我们为什么没有勇气也不能够揭穿所谓皇帝的新装？在当时，我为什么不敢说沙坪她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如果我说了，如果她或他也说了，如果大家都说了，那沙坪会死吗？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仇恨非要伤害别人不可，我们有什么权利以牺牲别人的尊严、生命和安全来换取自己的安全？我们常常抱怨制度、抱怨氛围，确实，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连共和国的主席都保护不了自己。然而制度与氛围其实不就是人所造的吗？特殊的、没有制约的权利造成了人性恶的张扬，使宪法也成为一纸苍白，制度与人性就是如此巧妙的形成了互动。

因为从1997年回归北京后即在北京落户安家，到城里办事也是来去匆匆，没有故地重游的闲散，所以对北京女三中的变迁始终不甚了了。昨天落笔，上网查找北京女三中，方知沧海桑田，女三中已经于2004年作为历代帝王庙被彻底修复为人文景观了。这座位于北京阜内大街的古老庙宇，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是我国现存唯一的祭祀中华三皇五帝、历代帝王和文臣武将的明清皇家庙宇，祭祀了188位历代帝王和80位功臣名将。新华网评介说：“历代帝王庙被视为中华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标志性建筑”。1931年，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熊希龄、张雪门在此创办了北平幼稚师范学院，1941年改称市立第三女子中学，解放后相继更名为北京女三中和北京市第159中学。

修缮前作为学校校园的70余年历史现在已然被湮没。那段不可理喻的往事是否也已经被湮没？沙坪的名字仍然挂在网上，简单记述着这样的事实：“文革受难者沙坪。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1966年8月22日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再点击，打不开了。这是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这是作为人类文明古国的一段耻辱的扭曲的历史。这座明清两朝的皇家庙宇，其政治地位与太庙和孔庙相齐，体现的是。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文脉，而在这里发生的不可理喻的人间惨剧却镌刻着文明时代的耻辱。

阳光洒满了未来的道路，历史沉重的一页虽然惨不忍睹，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回避，我们的下一代也不能够回避。我们忏悔，但愿过去的故事能够给予我们永恒的人性思考。

2005年4月6日清明祭

□ 摘自《爱思想》网

~~~~~

【拒绝遗忘】

澄清真相 分清主次

• 丁 东 •

（在2014年1月4日“‘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讨论会”上的发言）

今天讨论师大女附中1966年发生的“85事件”，我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我是师大一附中初中的学生，和卞仲耘的儿子王行是同班同学。和北京八中的书记华锦是一个院的邻居。当年的悲剧，就在身边发生，离自己并不遥远。

我们这一代，已经年过花甲，应当反思自己的过去，对历史有一个交代。反思的前提是恢复真相，而不是改写真相。我要坦率地承认，我自己当时是个人崇拜的信徒，文化革命的信徒。我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我想积极投身文革，又有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我虽然没有参与过武斗，但参加过文斗，用极左思潮的逻辑和语言，批判过同学，伤害过别人。

当时的舆论宣传导向，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这样的说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据穆欣回忆，在起草过程中，刘志坚曾建议删去这些话，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可见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高级干部，对宣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严重后果有预感。但是，对于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哪里懂得其中的深浅？就是当时动手打人的学生，也是那种狂热政治宣传的受害者。

还原历史真相要关注微观细节，也要结合宏观背景。卞仲耘之死，不仅仅是校长和学生两方面的事。要把基层的事件放在文革的全局中考察。从1966年6月开始，不只是师大女附中一个学校的领导被打倒，进而成为暴力摧残的对象，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几乎同时遭遇

了灭顶之灾。究其原因，就不能不直面当时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决策。

文革的发动者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易储”，也就是换接班人。“5 1 6 通知”里有一段话，是他亲自加上去的：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没有参加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讨论“5 1 6 通知”时一个字都不能改。毛泽东已经打定主意，用群众运动的方式，通过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实现权力的重新洗牌。但从哪里入手，具有偶然性。此前拿《海瑞罢官》开刀，编历史剧的人已经不安全了。批三家村，写杂文的人也不安全了。但这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5 1 6 通知”下发以后，中央文革有几个人分头点火，找“5 1 6 通知”传达范围内的人写大字报。5月下旬北京出现了三张大字报，一张是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张是学部吴传启的大字报，比北大早两天，一张是教育部卢正义的大字报，和北大同一天。毛泽东选择了北大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作为发动群众的突破口。这张大字报的题目点了宋硕、陆平、彭佩云的名字。陆平是北大校长、书记，彭佩云是副书记，和他们职务相似的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态度其实差不多，他们很快在本校成为众矢之的，纷纷倒台。

火烧各个学校的校长书记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标，他们是通向最终目标的垫脚石。平心而论，在党政军群各条战线，学校的领导干部既不是最腐败的，也不是官僚积习最深的。但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校长、书记们在6月就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文革初期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我们师大一附中的书记兼校长是刘超，他没有被打死，也饱受皮肉之苦，落下了后遗症。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领导运动的时间虽然不足两个月，但他们对学校校长书记的态度也应当正视。以他们分别过问的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所为例。刘少奇6月21日接见师大一附中工作组部分成员时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要争取陶书寅（师大一附中的副书记）起义，她不起义就批判。”邓小平7月5日接见了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讲话提到卞仲耘，说她“意志衰退”，“卞仲耘只给我寄了一个信，承认她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从中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体会一种舍卒保车、舍车保帅的心态，而非尊师重教，保护校长，砥柱中流，仗义执言。

刘、邓和这些受冲击的中学校长书记其实有三重关系。第一重是中央领导与基层领导的关系。第二重是参加革命先后的关系。这些学校的校长书记，大多是抗战前后参加革命的党员，他们的革命资历刘、邓是知道的。第三重是家长与校长的关系。刘、邓都有子女分别在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在读。这些中学是北京市的名牌学校，用今天的话说，是稀缺教育资源。作为家长，他们本来是乐于把子女送去读书的。运动以前，他们对校领导的態度也是友好的。如果认为校长书记是坏人，他们不会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可是运动一来，就翻脸不认人了。放在

文明史的长河里看，家长与校长这样的关系，也是不多见的。虽然很快刘邓也受到文革冲击，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但他们运动初期体现的政治伦理也有反思的必要。

陈小鲁、刘进、宋彬彬作为北京八中和师大女附中临时机构负责人，为当年没有保护好校长、老师而道歉。这种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实际上他们掌控局面的能力相当有限。不能超越时空，要求他们完成当时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每个过来人应当从严律己，拷问自己的灵魂。但对别人应当实事求是，不能要求别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

文革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文革的罪责应当在弄清真相的基础上，分清主次。毛泽东去世后，一些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革命重新掌握了国柄，否定了文革。80年代初追究文革责任时，审判了两案，强调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罪责，在清查四人帮和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一些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和一些文革初期积极造反的青年品尝了苦果。但有些地位高得多的老革命，其实在文革的某些阶段，也曾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对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公民有这样那样的伤害，他们只强调自己受迫害，并没有反思自己伤害过别人。这个问题，不应成为历史的盲点。

（2014年1月4日）
□ 摘自：《共识网》2014-01-13
~~~~~

【追究真相】

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的历史迷障

• 刘 长 •

继陈小鲁之后，又一位红二代宋彬彬选择了为自己文革期间的行为道歉。宋的道歉之所以重要，乃是因她与文革初期两起标志性事件有交集。

其一为8·5事件。1966年8月5日，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为文革后北京的首例。鲜血是革命的燃料，暴力的火焰自此蔓延，整个北京城打人成风，所谓“红八月”由此发端。笔者去年采访文革时北京市35中学生、地产大亨任志强，问他何时开始反思文革，他立马提到卞仲耘之死，说：从那时就开始怀疑，“文革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可见这一事件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的位置。

其二是8·18接见。几乎所有文革初期的参与者都会回忆到那一天，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此后还有7次接见），以军装亮相，这一镜头成为毛发动文革的标志。而这一天，宋彬彬作为学生代表，亲手给毛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戴上红袖章的毛，义无反顾地走下城楼，汇入了欢呼的学生之中。

因这两起事件，宋彬彬成为文革史研究的焦点人物之一。不断有文革研究者将8·5打人事件归责为宋，而又依据跟伟大领袖亲密接触的细节，将宋定义为接下来波澜壮阔的红卫兵浪潮的领袖和旗帜。既要具体的暴行负责，又要对宏大的历史负责，这大概是近半个世纪里，宋彬彬躲不开的魔咒。

不为人知的是，从她所属的政治派系来看，属于宋彬彬的时代，不过是两个多月的时间。

1968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那天，她所在的保守派红卫兵已经失势，正深陷政治形势变迁的苦闷中。8月18日，她站上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袖章之时，不是登场，而是谢幕。这一天之后，她所属的保守派红卫兵，已经被革命大潮甩在了身后，甚至成为了“革命”的对象。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宋彬彬最近10年间撰文、接受采访、公开道歉中，所表现出来的既有所承担又无比委屈的奇怪现象。

学者印红标在《失踪者的足迹》一书中，将红卫兵时期的青年思潮分为四个谱系，分属：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极左红卫兵。鉴别四个派别的红卫兵，除了他们呼喊的口号外，一个快捷方式是：考察他们对文革初期“工作组”的态度。

文革发端自1966年的5·16通知，起初是前台的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二人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惯例，往学校派驻工作组领导运动。而校园里面的学生，则针对工作组，出现了“保”和“反”的对立。

老红卫兵，是文革的先行者，他们很多人是干部子弟，早在文革之前就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革发动后，一部分老红卫兵坚持血统论，破坏性较强。最近频频出现报端的红二代孔丹、秦晓，包括道歉的陈小鲁，虽然不承认参与过暴力活动，但广义上仍属于这一派。

他们最先站出来批判教育，充当了文革“药引子”的功能，但运动开始后，这拨干部子弟很快发现，文革真正要打倒的不是教育权威、不是学校老师，而是他们的父母。于是，他们迅速被运动遗弃，乃至走到了反面，最终成立“西纠”、“联动”等组织，与中央文革分道扬镳。

而保守派红卫兵，则是在1966年6月到8月之间，即刘邓派驻的工作组进入校园之后，工作组所信任和倚重的一拨学生。这拨学生在这短短的两个月里面，是学生中的领袖，但在毛决定把战火引向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之后，工作组一夜间身名狼藉，拥护工作组的学生迅速成为了保守派，被认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被遗弃。此次出来道歉的宋彬彬、刘进，正是这个派系的学生。

当时，在工作组问题上，站起来反对宋彬彬和保守派红卫兵的这拨人，被称为“造反派”（后来这个名词的涵义扩大化，几乎所有文革参与者都自称造反派），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清华的蒯大富等人，就属这个派系，他们通过反对工作组登台亮相，最早公开打出“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公开揪斗刘少奇、王光美，迅速成为文革的主流。这些人，一直风光到了1968年下半年。

至于极左红卫兵，则是把伟大领袖关于革命的阐述信以为真，主张要普选、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一帮思想型青年，湖南的杨小凯即是其一。他们从未主流过，扮演的是思想上的异端角色。

上述划分极为粗略，但有助于理解宋彬彬的道歉与委屈。试想，那些思想和行为千差万别的青年学生，仅仅用“红卫兵”这三个字予以概括，而“红卫兵”又被“打人、抄家”等暴力字眼所取代，历史，也太过简单化了。

历史帐要算，而且要算细账，要负的责任，谁也躲不了，不该负的责任，史家也应给其一个公道。近十年来，海内外关于宋彬彬的争议，首当其冲的是，宋彬彬要不要承担文革的责任？要不要对红卫兵的暴力行为负责？说得更具体一点，要不要对北师大女附中校长之死负责？我

的答案是：要负责，但不是直接责任。

要理解卞仲耘之死，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卞之死发生在8月5日，6天前，因为毛对工作组的批判，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灰头土脸，感叹“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按照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的说法：“如果照工作组（他们后来被称为‘刘邓工作组’，即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的工作组）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遭到殴打并将会遭遇沉重处罚，但是不会被那样活活打死。”

7月30日下午，女附中工作组宣布撤出学校。对于紧跟工作组的学生，宋彬彬们失去了可以倚靠的臂膀，苦闷无奈，可从她日后的回忆中窥见：“撤了工作组的感觉就像找不到组织一样，我搞不明白自己怎样去‘运动’，不明白工作组怎么就成了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消防队，也不明白我们跟着工作组走怎么就犯了错误。”

从工作组撤离到毛泽东8·18接见之间的18天时间里，北师大女附中和所有学校一样，开始学生运动的新一轮洗牌，干部子弟和老红卫兵们大肆宣扬血统论，日后以造反派示人的反工作组的学生，则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叫“红旗”的组织，为女附中造反派红卫兵的前身。而宋彬彬所在的保守派阵营，在失去了工作组的羽翼后，也正在失去权力。

亲历者回忆，工作组撤离学校后，女附中校园里所有果树上的果子都被摘光了。“枝头的青柿子苦涩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园里充满破坏和恶毒的心理气氛。”

“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反工作组是正确的，她们成了革命的左派，而我和原学代会的成员都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成了‘保守派’。对于下一步运动应该怎样搞，学校的形势会怎样发展，自己应该怎么办，我感到很迷茫。”8月5日，就在宋彬彬和原来保工作组的这拨人在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时，几个初中学生跑来，告诉她们：有人在大操场打人了。

女校长卞仲耘正是被打者之一。当天，宋彬彬和原来的保守派领袖们两次到打人现场。据她们自述，两次都是劝阻打人，但最终，未能阻挡卞仲耘之死。

至于具体是谁打死了卞，多名当事人都说，是当时师大女附中高一年级的部分干部子弟。可几乎是默契，从未有人在公开场合点名过，究竟是哪几个人。（读者诸君可以自行分析这些干部子弟的政治谱系。而考证出直接施暴者，是另一篇文章要做的工作。）

宋彬彬等保守派领袖为何无法阻止打死人的事件发生？有部分原因是当时北师大女附中的权力真空：保守派因工作组的失势而失去了往日的神气，所以殴打卞仲耘的学生理直气壮地对宋彬彬等人说：“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神气了，今天让他们游游街有什么不对？”

宋彬彬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于是，在那个夏天最热的午后，女校长卞仲耘死在学生的群殴之下。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不是施暴者，宋彬彬当然有责任，但绝不只是在2014年1月12日会议上她致歉所说的“没有保护好老师”。她两次劝阻，已尽到了师生情谊的道义责任；她不是直接施暴者，所以不用负直接责任。但问题是：卞仲耘为何会被选定，成为施暴者的对象？

换言之，保守派学生在工作组进驻学校、发动文革期间，究竟干了些什么？是的，宋彬彬们没有像宣扬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干部子弟一样，对成分不好的平民子弟施暴，她们也没有像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一样残酷批斗、殴打老干部，但在短暂的两个多月里，她们的行动，为文革后来的很多暴行提供了靶标。

资料显示，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翌日，宋彬彬参与书写了北师大女附中的第一张文革大字报，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领向何方”，对学校不让其所在的高三学生参加运动提出意见，认为学校教育路线上有问题。

宋的大字报点燃了女附中的革命之火，学生们议论纷纷，迟迟不回教室上课，不少人也开始写大字报声援。2天后，工作组进驻学校，宋彬彬被选为“学代会”副主席。6月21日、22日，工作组在大操场主持召开了两个半天的揭发批判会，主要是批判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卞在会上遭到殴打。

6月底，工作组在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7月初，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胡志涛两位校领导被划为四类干部。全校师生开始集中对卞、胡等校领导的所谓罪行“梳辫子”、深挖深挖。在将卞仲耘变为“四类干部”的过程中，宋彬彬究竟发挥了一些什么作用，尚待进一步信息披露，不过，可以肯定，作为工作组信任的学生干部，宋彬彬至少是批斗卞的参与者。

我在研究湖南文革中的道县惨案时候发现，很多死者被杀的唯一理由是，他们是“黑五类”分子，即带有一顶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动手杀人者当然要谴责，但是，是谁给他们戴上这顶惹来杀身之祸的“黑五类”帽子的呢？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政工干部、站出来揭发“黑五类”的人们，亦难辞其咎。

宋彬彬没有参与对卞仲耘校长的直接施暴，但是在1966年6月初到7月底的两个月间，她任副主席的“学代会”参与的对卞的批判，埋下了卞仲耘之死的伏笔。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为卞之死负间接责任，委实不为过。

不过，历史的吊诡在于，直接参与对卞仲耘施暴的这拨女附中“高一的干部子弟”们迟迟不站出来道歉和忏悔，而率先站出来的宋彬彬们，以她们的道德良知和对历史负责的勇气，说出了她们知道的这一切，却得不到谅解，换来的只是更深的诘难，几乎要她们承担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卞仲耘死后两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文化革命大军，19岁的宋彬彬出现在城楼上。这不是她作为红卫兵领袖的开始，而是谢幕。事实上，走下城楼的当天下午，她就受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的攻击，“认为我们犯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

翌日，宋彬彬退出了女附中的学生组织。据她自述，此后，她远离运动，成了逍遥派，“连对学校的运动都不闻不问”，更没有去参加老红卫兵落幕之前的“西纠”、“联动”等组织。这显然是实情，因为她的父亲宋任穷很快被打倒，她和母亲一同被软禁。

负责打倒她和其它红二代父母的，是另一拨以造反派为名的红卫兵，他们在斗倒老干部后，也迅速完成了历史使命，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消失在历史的幕后。

2013年10月，原北京八中的学生、红卫兵领袖陈小鲁公开向昔日文革的批斗行为道歉。他是老红卫兵组织“西纠”的发起者之一。2014年1月12日，包括宋彬彬在内的原

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们，聚集在母校，也向老师道歉了。

一切似乎有些迟到，但还不晚，真相还是能够说得清楚——但是，一定要持续地说，要让历史的亲历者们都开口说话。如果历史仍是一笔糊涂账，那么，一定会有责任人躲在历史迷雾中，历史的审判不免“放走真凶，冤枉好人”，或者出现历史审判的“量刑过重”。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

作者：刘长，《南方周末》记者

参考资料：

《宋彬彬的文革反思与道歉》：电子刊物《记忆》第80期

《文革受难者》：王友琴，2004，开放书店

《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现场内幕》

□ 摘自《网易真话》

~~~~~

【直面良心】

宋彬彬的“错”和“罪”

• 徐 贲 •

“文革”标杆人物宋彬彬1月12日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这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但是，她就“文革”致歉的《我的道歉和感谢》却不过是一番自我辩解，尤其是撇清自己与卞仲耘校长之死的直接责任。她说，“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她的责任仅仅在于“没有想到”和“误以为无事”，好像她如果想到或以为有事，就会挺身而出加以制止似的。她还说，当时“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力，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这也是轻描淡写的自我粉饰，因为“文革”期间的迫害、残杀不是出于所谓的“无知”，而根本就是明知故犯，这是一种有目的的明知故犯，因为它可以给当事人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和别的个人利益。宋彬彬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年少无知、但“有良心”的红卫兵，这样的道歉里缺乏真诚的忏悔，她只是认了一些小“错”，而根本没有看到（或承认）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

人的“良心”到底是指什么？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良心看成是人的自然本能，也就是直觉的道德良心。另一种则把良心看成是关于道德是非、对错的知识。

自然本能的良心观认为，良心是一种如同想象力、推理能力、神圣感那样的知觉机能。良心让人听到自己内心的道德声音。在“良心的权利”这一说法中，良心即被当作一种人自然的自由向往，一种天生的机能。作为人天生的知觉机能，良心可以接受好的影响，也可以被不当的诱导、影响、宣传或洗脑引入歧途。良心并不一定总是“好的良心”，它也可能成为“错误的良心”，“粗糙的良心”，“偏狭的良心”。良心能让人做好事，也能让人做坏事。这就像一个人可以用想象力来想象好的东西，也可以想象坏的东西，想象力不等于具体的想象。

知识论的良心观认为，人可以用自己的善恶辨别能力来获得的关于善和恶的知识。有了这样的知识，人可以明白应该以什么道德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中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就说过，人只有具备了正确的知识，才会听从“好的良心”去行动，以此养成习惯性的美德，如正义、节制、坚韧，尤其是审慎。良心不是道德原则，而是在具体情况下对道德原则的运用，运用良心需要美德的支持，因此良心与美德是相互不可缺少的。

人因为有良心，所以在做错事情后会有罪感。弗洛伊德根据直觉良心说，把罪感看成是“自我”（ego，理智）与“超我”（super ego，良心）之间交战的结果。良心是一种直觉，例如，凡是人都会在良心里把“弑母”、“弑父”、“杀人”视为一桩罪恶。而理智则是辩解和推理的过程和结果，理智可以与良心相对立，压倒良心，但并不能消除良心，结果便产生了罪感。例如，一个名叫张红兵的前红卫兵在“文革”中揭发母亲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和他父亲一起向政府举报，后来方忠谋被枪毙。张红兵的舅舅方梅开回忆，张红兵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结果他们还是举报了亲人方忠谋。

可以设想，张家父子在举报时不会完全没有犹豫，而这个犹豫便是产生于良心与理智的交战，结果理智占了上风。但是，张红兵一辈子摆脱不了罪感。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2013年3月底，他的二审终审判决仍然是败诉。他的努力是向母亲公开忏悔的一种方式，不是认错去投案，而是“认罪”，希望以此来洗涤自己的罪过，这一努力的认罪意义大于实质的补救意义，因此，努力本身比努力的结果更加重要。

弗洛伊德不同意把“罪感”仅仅看成是害怕上帝对做坏事的惩罚。这是因为良心对一个人的错误行为有谴责的作用，就算上帝不惩罚，良心也在惩罚他。张红兵忏悔，先决条件是他还有良心，而不是他害怕上帝的惩罚（或“天谴”），或者他想从忏悔来得到好报。人们常说的“天谴”或“有好报”预设了一个赏罚分明的神，并把“罪感”与惩罚联系并等同起来。里克尔和弗洛伊德显然都不同意这种观点。

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文革”中遇害，一个严重的教训便是那时候的人把“有罪”（与良心有关）与“有错”（由政治或法律决定）完全混为一谈。一个人政治上“有错”，别人和他自己都会觉得“有罪”，他也会被迫或自愿地“认罪”，碰不碰就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将“有罪”混淆为“过错”会对有些人造成心理伤害，使得罪感脱离个体自己内心的善恶或是非分辨，而以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行为。

这种罪感很容易被个人或权力用作控制他人的手段和工具，成为一种有压迫性的心理自我感觉。例如，有的孩子因为父母期望过高，达不到父母望子成龙的要求，终生在内心埋藏着罪感。又例如，权力统治可以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有罪来证明他有罪。心理学家帕洛特（Les Parrott）称此为“错误罪感之病”（the disease of false guilt），那就是，“错误罪感让你认为，你所感觉到的就是真实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罪，那你就一定是有罪。因此，可以用强迫一个人深挖灵魂，不断写自我检讨的办法来让他觉得自己有罪，并以此确证他事实上有罪。这种以感觉证明事实的定罪方法给当事人带来的不是纾解解脱，而是焦虑和癫狂。

在中国，许多人罪的感觉和观念常常是紊乱的，深陷于难以自拔的失调状态。一方面是没有罪而被强迫认罪，最后觉得自己真的有罪，处于完全被外力洗脑、操控的状态。另一方面，却又在有罪的时候良心并没有什么不安，根本不觉得有罪。不该觉得有罪的时候却有罪感，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同样，该有罪感的时候却没有罪感也是一种心理疾病。这两种失调虽然不同，

但诱发和造成的因素都往往是来自外部。宋彬彬的道歉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有了某些表面认错的今天，罪感的紊乱仍然可能是还深藏在我们个人或民族幽暗心灵中的顽梗痼疾。

□ 摘自作者博客

~~~~~

## 【往事非烟】

雁落塞北

• 张曼平 •

### ◇ 难忘的 1968

1968年7月底，传来了工军宣队进驻北大制止武斗，要求我们回校的消息，8月初我又回到满目疮痍的燕园。这时武斗已经停止，但是残存的“战场”依然是我们留影的好地方：37楼大门口、连接28楼和30楼的天桥……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接下去的几个月，工宣队让我们“斗私批修”，到12月就按照上级通知进行我们1968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0362一共120余名学生，分配方案一公布，大家都傻眼了：一半以上的指标是到各个省市、地区报到，到地方再分配；其余百分之四十几是到中央各部：煤炭部的鹤岗、鸡西、双鸭山等煤矿，林业部的大小兴安岭林场，化工部的西宁电化厂、锦西化工厂，石油部的茂名炼油厂、抚顺石油二厂，六机部的新港船厂，再有就是防化兵要了一些人。120多个0362毕业生中，能够到黄河以南的只有到茂名炼油厂的五名。余下的到西宁、锦州都算是好方案了，不少同学被发往中国雄鸡版图的鸡冠位置上——大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

不用说，能到部队的绝对是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到其他中央部委下属单位的也得是出身无大问题的，至于黑五类子女只能到前程未卜的各省市区去听天由命了。到各省地方报到分配方案有辽宁、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省，其中到山西省各地区报到的有10人，分属临汾、晋东南、晋中、忻县和雁北地区。工宣队大致扒拉出包括我在内的10个同学到山西，就让这10个同学一起开会自己选择去向。虽然当时还没有去过山西，但是地理知识告诉我肯定是南部比北部好。那几位同学都以种种理由从南往北地挑走了晋南晋中的方案，就剩下雁北、忻县的四个名额留给我们四个来自上海和北京的同学了，我也只有去雁北的份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听说我去雁北，还安慰我说，山西的煤矿和工业多，你可以到那些工厂去。

拿到大同市雁北地委的报到证已经是12月20日，我告别生活了六年多的燕园，回上海稍做准备。12月22日传来了“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我一看最新指示里有“大学毕业的子女”，便觉得不妙，没想到这个命运就落到我的头上。

12月30日，我和同学程家濂两人一起到雁北地区革委会报到，政工组大笔一挥，在我的报到证上大书“右玉县暖泉大队接受再教育”，程家濂则被派到左云县贾家屯大队接受再教育，我们要求说既然接受再教育，两个同学分在一起行吗？答曰：不用说同学，男女朋友也得拆开。真的就有一对西安交大的未婚夫妻被拆散分别到左云县和右玉县两个县插队，说是两个相邻县，但是大队都离开县城有几十里地，从大队到县城再到邻县，再搭便车去爱人的大队，路上就是两天。

## ◇ “接受再教育”

赶着年末到右玉县报到，才知右玉是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位于山西省最偏远的西北角山区，七万人口的小县。这里交通不便，离开最近的火车站大同有110公里山路，汽车要走4个小时，每天和外界的联系只有一班长途汽车到大同。县城里只有近千居民，一色破旧的平房，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气候寒冷，全年无霜期才90天，玉米也无法成熟，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极差，和山西大部分地方不同，地下资源也贫乏，农业一向是广种薄收，是山西省最贫困的县之一。

在县里招待所等了几天，待去暖泉大队的大学生汇集得差不多，就找来一个大卡车把我们带行李送到了大队。我们被告知，我们是到暖泉大队当农民，取消城市户口和商品粮供应，和早先到那里的大同市中学生插队知识青年一样吃原粮，像农民一样，从生产队领取原粮自己加工。原应有的大学生毕业实习工资也被取消，改为工分加补贴：即每个月只发给应发42.5元的实习工资的80%，34元，下余每月8.5元到年底分红兑现，多退少不补。实际上多退是几乎不可能的：当地的每个劳动日值一般是八九分钱，好的到一毛几，我们这个所谓学大寨先进大队算好一点，一个劳动日值也就是一角钱，干一天换不到一盒火柴（两分钱）的大有所在。我们即使出全勤一个月的劳动所得也只能在年底分红拿到三元钱。在我们插队的两年里，实际上国家规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城市户口、商品粮、取暖费待遇统统被取消了。由于吃粮食数量方面按照知识青年的待遇，一年528斤毛粮，比当地社员还稍强一些，能吃饱肚子，社员们年年秋天分得的粮食都只够吃到春节前后，一开春就家家户户没有粮食了，要向队里借粮度日，要变稠为稀，以稀汤寡水烂腌菜来维持超强的体力劳动。

到大队之后，我们来自北大、哈工大、西交大、太原工学院、山西财经学院等的七八名大学生被安排在同一集体户，自己开火做饭，住则分在几处老乡的闲房。到达暖泉大队正是三九严冬。屋里和外面差不多相同温度，没有温度计测量，只看到屋里放的水缸，一天天从外向内一圈圈结冰，最后冻成一大坨冰疙瘩，把圆心部分顶起成为锥形。每天晚上睡觉就得把两床被子盖上，再压上大衣、棉袄等所有衣物，才能勉强入睡。

我们这个劳改队被队干部分配去干修造大寨梯田的任务，削高填低造平川。把一片坡地高处的黄土装上小排子车，利用坡度飞驰下坡，到岩头一刹车一颠，满车黄土倾泻坡下。我负责推车的活儿。一次推着满车黄土有七八百斤，飞驰到岩头刹不住车，双手又紧扶着车辕没有撒开，车到岩头翻滚着飞下三四米的岩头，我也被带了出去，摔在岩头下面地上，几百斤重的排子车掉下三四米，粗笨的车辕带着下坡的惯性重重地砸在我头上，我当时就眼冒金星，刹那间失去知觉。也算我命大，砸的角度凑巧了，车辕没有砸到太阳穴上，那样起码是重伤甚至可能小命玩完。我的头没有开瓢，只是击打成严重的脑震荡，劳改队友把我扶着送回住处，好心的房东大娘给我煮了两个荷包蛋，在家里休息一天，第二天头稍微疼得轻点就又被催着去出工。这就是我们接受的再教育。

## ◇ 出路

当时让我们去插队时并没有期限，大家也没有人敢问插队到什么时候，将来怎么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很快我们在暖泉大队就过了两个冬天，还是没有看到一点离开农村的动向，一次到县城去办事，我就到县广播站去毛遂自荐，说原来我在北京大学广播台做过机务，会维修广播器材。当时正好县广播站要发展农村载波广播，缺乏技术力量，我小露一手，广播站立即决定把我借调出来，他们通过县革委暂借我搞载波，这样我比一起插队的其他大学生提前半年离开了大队。最重要的是在广播站有自备发电机，可以脱离过了一年半的无电生活。到1970年底，经过两年的“再教育”，我们插队的这批大学生和当时到军垦农场锻炼的差不多同时再



分配。其他几位大学生都在县里面中学或者机械厂工作，我则在这时正式分配到县广播站当技术员。所有人都在本县就地消化了。

在县广播站一干就是九年，因为原来的技术员最高只有中专学历，我所以作为技术骨干很快就担纲了全部技术工作，搞完了载波又搞电视差转，后来县里筹建小化肥厂，又把我抽到筹建小组负责技术。其间有几次大同一些单位要商调我去工作，但是县里根本不松口。

#### ◇ 返回未名湖

原来以为这辈子就得在县里呆下去了，打倒四人帮后形势出现了转机，1977年恢复了高考，同时传来北大招收研究生和回炉生的消息。回炉生是，1963—1965级的，我们没有资格，要想离开右玉县，只有考研这背水一战。北大化学系一些老师也给我来信，给我寄来复习资料，鼓励我考回去。但是从得知招收研究生到初试只有短短四个月时间，而从1965年10月到四川参加“四清”到1977年底学业已经荒芜了12年。五个月要重新拾回多年没有碰过的英语和专业课本，难度非常大，加之当时报考研究生还处于地下，还怕万一考不上还必须留在原单位工作，所以也没有可能请假复习，只是在下班之后挑灯夜战。好在60年代在北大的基础打得好，复习不久就找到了感觉，初试时候发挥很好。1978年5月初试之后6月份得到北大消息，说成绩很好，列报考分析化学专业80余人第一。但是在复试时候去拜访导师高小霞时她还是给我泼冷水，说因为你的家庭出身问题，还是有可能不被录取。但是感谢胡耀邦在1978年5月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进行了拨乱反正，到9月份时家庭出身已经不成为录取障碍了，我终于接到了北大研究生的录取通知。在10月份，我又再次走进未名湖，成了“文革”后北大首届研究生。三年以后，我们15位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硕士毕业生又被挑选成为北大历史上首批的博士研究生。在1984年4月，我拿到了编号为北京大学0002号的博士学位证书。

□ 原载：《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奚学瑶等主编，九州出版社8月版

#### 【劫后反思】

####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九）

• 孙怒涛 •

（上接Zk1310a，第七章 414的外战和内斗（1967.6—1968.9））

#### 第二十三节 在罗征启问题上，我也当众说谎了

解放干部的工作，两派都在进行。只是，两派的干部政策都有很浓重的派性色彩。譬如，对亮相到自己这一派的干部，大力支持，悉心扶植，尽力鼓吹。而对于亮相到对方的干部，就竭力打压，丑化批判，甚至关押批斗。

客观地说，亮相到414的干部所要承受的政治风险，远大于亮相到团派这一边。这在清华园里应该是一个常识问题，毋庸多言。

在团派的眼里，414是一个右倾复辟的保守组织。为了打垮414，团派千方百计地要从亮相到414的干部里整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来，然后再整成是这个反革命集团操纵了414的坏头头们。414有过抓陶森、批凌瑞骥挑动群众斗群众等过火的错误的行为，但是还没有

热昏到想在亮相到团派的干部里揪一个操纵团派的反革命集团的地步。

在414内部，对待干部的解放上，“三七战团”比较谨慎，顾虑较多，特别怕右，远远不及“东方红战团”的大胆、果敢、进取。

为了推动干部解放，414树立了谭浩强、吕应中、罗征启这三位中层干部作为典型。对这三位干部，团派也知道他们的典型意义，均采取了先是利诱，再是威胁，继而死打的态度。414对这三位干部，有点微妙的差别。对谭浩强、吕应中这两位干部，414内部观点一致，态度明确，坚决地保，大胆地用。而对罗征启，在总部委员中，在414群众中，对该不该死保罗征启是有很争议的。不仅倾向于“三七战团”的总部委员表示很慎重的态度，即使是属于“东方红战团”的骨干中，对死保罗征启也有持异议的。个中原因，是认为罗征启的观点太右了。

对于罗征启勇敢地亮相到414，我是真心欢迎的，也是很佩服的。但是对他的不少观点，我感觉太右，所以很有顾忌。414派客观存在着态度激进而观点偏右的“东方红战团”与态度温和观点偏左的“三七战团”。所以，亮相到414这边的干部，在观点上也有偏“东方红战团”与偏“三七战团”的差别。如同为清华牌干部的谭浩强与“三七战团”的关系较好，罗征启与“东方红战团”的关系很亲密。周泉缨说：“罗（征启）则是我在‘东方红战团’内部唯一称之为亮相到‘东方红战团’的清华干部”。亮相到414的干部有数百人之众，能被“东方红战团”认可是赞同“东方红战团”观点的，屈指可数，寥寥几人。正因为如此，沈如槐非常欣赏罗征启的才华，更赞同他的政治观点，佩服他的政治见解。我当然不认为罗征启是走资派，或者是走资派伸向414的一只黑手，但是他对旧清华十七年的观点实在太右，我对他持相当谨慎、警惕的态度，从没与他个别接触过。记得有一次在新水300室召开的对罗征启的帮助会上，我甚至做了这样的一个发言：“要好好地揭发批判自己的错误，别以为亮相到414这里就找到避风港了！”罗征启听了，非常委屈。会后对人说：“团派骂我、打击我，我都不怕。没想到414中，特别是头头，竟然也这样说，真想不到！”

尽管团派对谭浩强、吕应中都是打压的，相比较，对罗征启的打压更重。正因为如此，414把解放罗征启当作是解放中层干部的一个带标志性的突破口。如果罗征启能得到解放，要解放清华其他的中层干部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414对待罗征启，从支持鼓励他勇敢地亮相到死保他，这中间也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到后来，敢不敢死保罗征启成了414的干部政策是真的解放干部还是假的解放干部的试金石了。也就是说，414很大一部分的政治命运与罗征启的政治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1968年1月30日，罗征启被团派抓走。经历近两个月的严刑折磨以后，3月27日，他从关押他的三堡（地处八达岭附近的清华疗养所）逃离出来，历尽艰辛，死里逃生，躲在城里的亲戚家里。老团在城里搜捕他，他觉得非常不安全，于是给沈如槐写了一封信。沈如槐看到此信后，虽然心有主意，但感觉事关重大，不敢擅自决定，找核心组开会研究。龙连坤是干部，怕他知道了此事反而不便表态，让他为难，所以这次核心会没让他参加，只有我、陈楚三、汲鹏、宿长忠、刘万章等不多几个人。还有一个是为罗征启传递消息的老印，他是“东方红战团”中与罗征启关系最密切的人之一。

沈如槐先介绍了罗征启目前的状况，并念了他向414求援的信件。罗征启在信中说，他趁守卫不备，跳窗逃了出来，摔坏了腿。瘸着拐着爬着到了沙河，昏了过去，被路人救起，送回城里。因团派在城里大肆搜捕，很不安全。言下之意希望得到414的保护。沈如槐问大家：“我们怎么办？”沈如槐自己首先表明了坚决保护罗征启的态度。

作为一名亮相到414的干部，竟受到团派如此不堪的政治迫害。414无力把他救出来，他靠自己的努力侥幸逃脱。现处于危难之中，有性命之虞。414作为一个组织，绝没有置之不理的道理。这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因此而可能置414于非常被动的局面，这点，我也是很有顾虑的。要是414不管，罗征启被老团再次抓去，不仅罗征启本人极有可能丧命，414也将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总之，我当时的感觉，保护罗征启是必须的，但是保护他确实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必须非常慎重才行。

与会者一致同意把罗征启营救回学校。毕竟在414的地盘上，比在他亲戚家里要安全得多。营救由沈如槐和老印具体负责策划和实施。

把罗征启接回学校的行动策划得很周密。一天晚上，罗征启化了装，乘小车闯过南校门，到二教下，拥入科学馆。整个过程有惊无险，相当成功。之后，沈如槐又开了核心会，向大家通报了这次行动的经过，并告诉大家，罗征启现在就躲藏在科学馆三楼靠南一间密闭的小房子里，生活起居由老印照看，连在科学馆里的414广播台人员及守卫人员都不知道。在会上，我提议要罗征启写一个材料，譬如在被老团关押期间，他们问了他哪些问题，他是如何回答的，他是怎么逃出来的，等等。我对他不是很放心，希望能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在团派突然抛出他的材料时措手不及。

罗征启的逃跑，让团派十分恼怒。到处搜捕也一无所获。一天，团派派出几个人，在罗征启父亲的家里，把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当工人的罗征启弟弟罗征敷抓走了，想从他的嘴里掏出罗征启的行踪来。一顿拳打脚踢之后，给罗征敷嘴上塞上一团擦车用的棉纱，绑着手按在吉普车中间过道上。到了清华，一看，罗征敷早已被憋死了。此事414知道以后，人人义愤填膺，大喇叭大字报上一片都是对老团的讨伐之声。

沈如槐想，罗征启就在科学馆里，他看不到什么，但是高声叫骂的喇叭声还是能听得到的。看样子这个噩耗是无法对罗征启隐瞒的了。老是瞒着，反而更被动。于是，他拉上我到科学馆那间密室里，告诉罗征启他的弟弟被老团打死了，我们代表414和其他关心他的战友向他表示沉痛的哀悼。罗征启已经从广播中听到了这个痛心疾首的不幸消息，这次不过是从我们的嘴里得到了证实而已。看着罗征启得知胞弟无辜死难，他的双眼怔怔的，心中的痛楚无以言表。我们也深感空洞的安慰是多么的苍白、乏力。我对他并没有亲切感，依旧认为他的许多见解是很右的，但是这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难受，对他十分的同情。我想我一直对他采取冷淡的、责难的态度是不是太无情了？亮相到414的干部要经受这样大的政治风险，自己和亲属要付出这样惨痛的代价，这是我以前无法料想到的。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事态会发展到何等严重的程度，对414会带来多严重的影响，这些我心中无数。我建议沈如槐应该把罗征启的事情在总部内公开，不能光我们几个核心组成员知道和操作。沈如槐同意了，在科学馆四楼阁楼上召开了一次绝密的总部会议。果然，一名“东方红战团”的总部委员对死保罗征启大为不满，被大家以维护414的利益所说服。总部会议决定，对外，保罗征启的调子不降。在内部，由傅正泰负责，对罗征启进行全面审查。对414群众，为防内部争吵军心动荡，严格保密，不准泄露一丝消息。

尽管没有什么证据做依据，团派凭着直觉还是一口咬定是414把“反革命集团首犯”罗征启给包庇起来了。团派广播台不断广播罗征启在关押期间交代的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操纵414坏头头的“反革命罪行”。在团派强大的宣传攻势面前，好些414群众心里虚虚的，忐忑不安。虽然，对于老团的造谣早就习以为常，但是罗征启问题毕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只要有一条罪行坐实，对414的影响和冲击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414群众强烈

要求头头表态，澄清事实真相。

为了让广大的4 1 4群众坚信无疑，在主楼后厅召开的4 1 4战斗组长会议上，我们这几个总部核心要员，个个都在会上表了态。沈如槐带头表态，说罗征启是团派抓去的，目前他的下落总部确实不知道。他的表态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接着由我表态。我心里非常矛盾。要说我不知道罗征启的下落，那明摆着是说谎，是欺骗。要是我说罗征启就在4 1 4的保护之下，那这消息肯定像一颗原子弹爆炸，这局面，是我、是4 1 4都无法应对的。能不表态吗？也不行。4 1 4群众的压力之大，仅靠沈如槐一个人表态已经不能取信大家了。要是其他总部要员都表态了，只有我一个人不表态，那其实就是宣告了我与其他总部要员态度上的不一致，群众依旧会疑虑重重，4 1 4人心依旧不能稳定。而且，4 1 4群众必然会指名道姓要我表态。总之，只要我是在学校里，我是没法回避表态的。为了4 1 4大局，我也只能表与沈如槐一样的态。我说我们真的不知道罗征启目前的下落。

我们一个个依次登台表态。4 1 4总部所有的核心都表态了。4 1 4群众可以对我们中的某一个人不太信任，但是对我们这些核心的集体表态，他们没有理由再不相信。他们不安的心总算暂时放心一点了。

我记得我们总部核心中有一位是这样表态的：“罗征启肯定是让老团打死了！他们打死了人，不好交账，就造谣说他逃跑了。我们一定要向蒯大富讨还血债！”我听了这样的表态，心里很不满意。我们明明知道罗征启在4 1 4这里，说不知道罗征启的下落，这已经是在说谎，在欺骗4 1 4群众了，已经很过分了。罗征启没死，硬要说罗征启是让老团打死了，这比一般的辩解、说谎又过分了一大截，这是明目张胆的在造老团的谣了。唉，即使我心里非常不满，我也不能站出来去“辟谣”呀！

从我做总部委员起，不论是做“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委员还是做4 1 4的总部委员，我对自己提的一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说谎，不辜负那些信任我的群众。蒯大富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除了他的政治敏感性，他的坚忍不拔，他的雄辩口才这些正面的以外，还有就是他的诚信度不够高。他在传达中央首长讲话的时候，自己听得进的或有利于自己的，会传达得很详细。不对自己胃口的或不利于自己的，就会有意无意的少传达或不传达。所以那个时候有不少大字报批评老蒯经常“贪污”中央精神。我一直以此为戒，尽力做到诚实、透明、实事求是。我接触中央首长的机会不多，凡是需要由我传达的，我都不凭个人好恶，悉数传达。有人亲口对我说，跟着蒯大富，政治大方向看来不会有错，但是心里不踏实。要是跟着我，明知道我的政治判断力是很有限的，但是起码不会欺骗他。他说这也是他选择4 1 4的原因之一。我听了他的话很受感动。我心里暗暗说，一定不能辜负了这份难得的信任。

在做头头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基本做到了诚实、透明、不说谎。但是这一次，我当众说了谎话。我一边撒谎，一边心里十分凄苦！要是为了良心的安宁，我不应该撒谎。但是为4 1 4群体的利益，我就必须撒谎，以度过眼前这段非常时期。最终，政治利益压倒了政治道德。

我这个人，对政治很感兴趣。但是，对政治感兴趣与搞政治，完全是两码事。从大处说，我的政治眼光、政治魄力、政治智慧、政治胸怀，都远远不够。小而言之，连一点小小的政治手腕、权谋伎俩都不会，全是按本色做事。我实在是一个迂腐的人，连在什么场合下、有多重要的事情上、允许说多大的谎都不会把握。那些政客们惯常使用的尔虞我诈、颠倒黑白、心狠手辣、脸厚心黑等等，我更是见不惯，受不了。所以，我明白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不适合在政界商界发展、不适合做别人的喉舌。我能做的，也就是教点书，搞点科研，从事尽量不需要说谎或者少说谎的行当。这是我从这件事中悟出来的一点道理，也算是多了点自知之明吧。

要说我从小长大没说过一句谎，那也不是实情。但确实是极少说谎的。而且，基本上是小事上，为保全自己而又无害别人的事情上。这次在有关罗征启的问题上的说谎，是我最严重的一次说谎。说谎以后的感觉太不好了。再往后，又有好多次不想说谎而不得不又说谎的。那是以后清查五一六运动、批林批孔、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天安门事件、追查政治谣言、等等等等，一直到六四“动乱”。在各种会议上，总被组织要求表态，不表态还不行（想想文革初期做一个逍遥派真不赖，没人逼他们表态，逼他们参加运动）。看着别人或真或假的表态，看看自己言不由衷的表态，我真不知道这样的表态有多大意思。为什么上面一定要每个老百姓都表态呢？后来想想，上面就是要摧毁你的意志和自尊。尽管你事后可以辩白说自己是被迫表的态，是无奈无辜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就在表态的那一刻，你的道德是低下的，你的良知是蒙尘的。什么时候社会的氛围真正是言者无罪了，不以言获罪了，那么昧着良心说违心话的情况也会少多了。

当另一位总部核心反诬老团打死了罗征启的时候，我心里有点生气：这样说老团太过分了吧？几个月后，清华发生了百日大武斗。期间，无辜的孙华栋真的被一教“狗熊”这帮老团活活地打死了！文弱中层干部刘承娴105被团派专案组折磨得跳楼致死了。“罗征启被老团打死了”的话是假的，但是孙华栋、刘承娴等被折磨致死却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书生气又一次被残酷的事实所嘲笑。

至于罗征启，此后我与他一直没有什么联系，曾听闻他在深圳大学工作。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深圳出差，与朋友们聚会。席间，有一位在深圳大学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说非常的凑巧，今天正好是罗征启被宣布开除党籍的日子。老罗对来宣布这一决定的人平静地说了句“愿贵党今后好自为之”的答话。朋友还告诉我，老罗被严密监控着，监视着他与什么样的人有来往。

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既然今天是这样一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我说我是无论如何都得去拜访他的。这有什么好怕的呢？尽管已是深夜，我和朋友们一行十来个人一起来到罗征启家。我郑重恭敬地向他表达了我对他由衷的敬佩和真诚的问候！这敬佩之情是文革以后我听闻了他的几件大事以后油然而生的。

罗征启，真正清华人的良心！

## 第二十四节 两派之外，清华的第三种势力

在团四两大派政治势力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弱小的第三种势力。这其中大致有两部分：逍遥派和中间派。

在文革开始，是保蒋还是反蒋，是支持工作组还是同情蒯大富，在“是”与“否”之间举棋不定的人很多，但是大家参加文革的态度都是很积极的。那一阶段，几乎没有什么逍遥派。

后来，因为支持工作组、参加“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八九”派在与批判工作组、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八八”派的争斗中落败以后，不少“八九”派的人，还有一部分出身黑五类的以及父母被冲击的干部子弟，开始不再积极参与运动而趋于消极旁观，安于逍遥。逍遥派中有些人借大串联之际免费乘车住宿的优惠条件游山玩水，有些人借串联之名行“并联”之实。也有不少对照熙攘攘的大字报大辩论不感兴趣，躲在某个角落里背外文的，或在宿舍里堂而皇之搞“线路斗争”的。随着运动无尽头地拖延下去，这一支逍遥派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对文革的厌倦情绪在加深。逍遥派们各自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情，共同的一点是这些事情大都与文革无关。他们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文革、抵制文革。党团组织的瘫痪给了这些逍遥派以足够的生存空间。

中间派往往是既不同意团派的观点又不赞成4 1 4的观点，有点无所适从，于是就游离于两个主流派中间。即使观点上有偏向团派或4 1 4派的，有的甚至也偶尔参加团派或4 1 4派的活动，但是都不十分积极。不过，他们又与逍遥派不同，他们都比较关心学校的运动。

逍遥派也好，中间派也好，由于没有组织团体或者团体不够强大，所以既发不出响亮的声音，又显示不出雄壮的力量。他们在清华文革的舞台上是被边缘化的，还算不上是一支与团派、4 1 4并雄鼎力的第三种势力。

在“4 1 4串联会”成立之后的5月初，以栾德富为首的“五七串联会”成立。它的宗旨是反对派性，促进联合。栾德富是温和的老团，他既反4 1 4的派性，也不留情面地反团派的派性。但是“五七串联会”未能制止4 1 4的分裂。后来，栾德富参加了4 1 4，“五七串联会”也随之解体。不管怎么说，“五七串联会”可以算是一支代表了中间派的第三种势力。

段云富（6字班学生）、魏洪波（电机系教师）都曾经是4 1 4的总部委员。在总部里，因为常常与“东方红战团”的某些人观点不一致，感觉很压抑，就不再常参加总部会议了。但他们对运动非常关心，并没有逍遥或消极。1967年9月底，团四两派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联合总部”。这是一次貌合神离的联合，两个总部的各自机构仍然在独立地运转。这期间，经过批周泉纓、4 1 4战歌事件，两派关系实际上已经倒退到联合之前的状态。段云富、魏洪波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两派又将公开分裂之际，于1967年12月25日成立了“清华井冈山联合总部1 2 2 5战团”。他们的宗旨是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促进联合，进行“斗批改”。他们宣称“1 2 2 5战团”既不属于团派，也不属于4 1 4派，是属于“联合总部”的。他们的成员，不问是老团还是老四，只要是反派性、反武斗、促联合的就行。“1 2 2 5战团”是继“五七串联会”以后的又一支代表中间派的第三种势力。而且，它的影响比“五七串联会”更大，存续时间也更长。很遗憾，“1 2 2 5战团”成立不到十天，两派爆发了1。4武斗。成立以后四个月，爆发了百日武斗。“1 2 2 5战团”也未能阻止武斗的爆发。

我与栾德富相识，彼此是朋友。我与段云富、魏洪波更熟悉，在4 1 4总部里，是观点相近的同僚。尤其与段云富的关系更好一些。他领导的“巴黎公社”曾是“天安门纵队”的重要成员。

从观点上说，如果说我在1967年的5月份的时候根本就听不进“五七串联会”的话，那么到1967年年底、1968年年初，我对“1 2 2 5战团”的话已经很听得进了。虽然在派性如何产生，分裂如何造成等方面，我的看法与他们还是有不少差距的，但是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促进联合等主张，我是完全赞同的。

我很同情段云富他们，觉得他们反派性促联合的宗旨和目标都是对的，心地是善良的，愿望是美好的，那种不懈努力的精神也是非常令我钦佩的。但是我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4 1 4头头的身份和比较强的派性，我不可能公开参加“1 2 2 5战团”。另一方面，我认为他们的主观愿望虽然很美好，但是没有抓住派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实质，仅单纯地反对派性，除了失望以外，不会有良好的实际效果。

所以，我仅仅是同情他们，并没有对他们有切实的支持和帮助。当然，我也不会去批评、嘲笑他们，更不会刁难、打压他们。

反对派性、反对分裂、反对武斗、促进联合，这一口号深得清华绝大多数师生员工的共鸣和支持。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大方向比团派和 4 1 4 都更正确些。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点：

1、派性只是表象，指导文革的理论必然导致两派的产生，导致两派的分裂，导致派性的发作。派性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北京市革委会组织了封闭的以消除派性为目标的高校学习班，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1 2 2 5 战团”的权威性、政治能量和影响力是无法与北京市革委会相比的，那么，它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2、那个年代是以走极端为最革命、最坚定、最勇敢的。反对 4 1 4 的右倾机会主义最坚决不妥协的，在团派里面被称为铁杆老团，最吃香。同样地，反对团派极左路线最坚决不示弱的，在 4 1 4 里叫铁杆老四，也是最看重的。掌握团派话语权的最坚定分子与控制了 4 1 4 大局的最坚定分子，都认为自己是革命性而不是派性，都认为自己在最坚定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认为只有自己这派才是左派，对方是右派或极左派，认为只有自己这派掌权才是代表无产阶级掌权。尽管他们在人数上占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少数，但是政治能量极大。有这两极存在，作为代表中间群众、代表全校大多数师生员工心声的第三种势力，与其相比，政治能量实在太小了，处于无关轻重的地位。

打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抗战胜利后，尽管全中国民众要和平，反内战。但是国共两党却互不相让。民主党派的声音反映了民意，促成了重庆和谈，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防止内战的全面爆发。其根本原因，民主党派既不明白国共两党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根源所在，自身的政治能量又太渺小了，构不成举足轻重的分量。

尽管“五七串联会”、“1 2 2 5 战团”在两派期间发挥的实际效果很有限，但是，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积极地顽强地发出反对派性、反对武斗、反对内战、要求联合的“第三种声音”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沉默的大多数都能像他们那样发出吼声，他们的队伍强大到足以对两派起到牵制、调解的重要作用，甚至能影响运动的走向，那么清华的文革就可能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 0 1 3 年 2 月第一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